

〔美〕格哈特·温伯格 著

希特勒德国的 对外政策

下 编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年

（上册）

商 务 印 书 馆

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

下 编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39年

(上 册)

〔美〕格哈特·温伯格 著

何 江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前 言

我在上编(叙述 1933—36 年事件,1970 年版)的前言里曾论及缺乏一本关于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综合性论著,在此期间内,这种缺乏并未被弥补。可供查阅的档案资料以及已出版的著作均已大增,但世界怎样竟在二十余年期间内第二次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火,这个问题继续是一个颇为人们关心的问题,但对此的论述要么非常简略,要么是有限度的专题性论述。本卷在重新评价这些问题时,毫不拘泥地不仅援引了许多档案资料,而且还参考了其他学者的著作,甚至参考了持有不同看法或得出不同结论的著作。

我在思考人类何以竟遭受如此巨大灾难的浩劫这一重大问题时,有两种考虑给我的印象颇深。第一种考虑是:人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里对于那场被称为“大战”的回忆,具有莫大的意义;许多决定和抉择是按照人们正确或错误地所吸取的被认为是那场冲突的教训其爆发、性质及结果的教训来作出的。各人都从这种教训的角度来看问题,常常专注于不同的方面或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但仍各按其当时诸问题彼此关系的解释来承担这种经验的责任。

如果往事的这个遗训是旧事重演问题,则对于新事态发生的理解就必然集中在德国的政策上。在某些人士的心目中,与这种看法唱反调是时髦的。有时听到这种说法,德国之所以把欧洲推入战争乃由于别国对它姑息过度——而日本之所以把亚洲推入战争乃由于它被姑息得不够。但事实依然是,德国在欧洲先采取主

动(意大利在较小的范围里也如此),日本在东亚先采取主动。在
对这个问题进行多年研究后,我仍然认为:对于世界怎样被推入战
争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时最有意义的办法,是集中注意那些作出了
关键性抉择和决定的人。在作出抉择和决定时,他们所受的影响
既有其国内局势的发展,又有别国的行动和反应,但这绝不改变主
要趋势的根源。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如果用手走路而不用脚走路
就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这个主意有其标新立异的魅力,但易于
令人产生错觉。

在三个采取主动的国家里,德国是最重要的。意大利能在非
洲发动一场殖民地战争,日本能在东亚发动一场有限战争。对直
接受害者来说,这种战争是够可怕的了,但这些战争都未必会蔓延
到全世界。只有那个作为欧洲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强国
的德国的主动,才能够而且确实已超出一个地区或大陆的眼前限
度而爆发成全世界性的大灾难。因此,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
的研究集中于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就可提供一个有用的——
我希望是有成果的——办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已在
二十世纪初就摧毁了他们对全世界加以控制的权力的基础;既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开始了的过程,这些问
题不仅对于欧洲的较大或较小的诸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都有重
大意义。

我的上编里探讨了使欧洲形势大为改观的外交变革的来龙去
脉。到1936年底,德国已从一个被容忍的平等对手变成了在大陆上
的主要强国。自从上编问世以来,又有涉及该时期的一些新资料
和许多新著作发表了;但对上编几乎毋须因此而作重大改动。诸位
评论者是与人为善的;迄今的批评所集中注意的,与其说是论述的
实质,还不如说是我不愿与最近的解释派展开辩论和参加德国学者

论争的行列。既然我的研究旨在说明三十年代的诸事件，而不在说明六十年代的诸论据，那种批评也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本编。但在上下两编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在我论述1933—36年期间时，详细地和学者式地论述这些年里诸事件的著作还非常少；因此，大部分论述有必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另一方面，对于1937—39年期间，则已有大量的学者论著，其中许多论著的质量确实很高。依此，就有可能在许多地方跟随其他学者去翻越证据的大山；我已在注释中力求表示我对这些指引的感激，并表明我在哪些方面和为什么决定持有与之略有不同的看法。

到1936年底，纳粹党政权不仅巩固了其在德国的地位，而且还为其正在谋求的扩张奠定了基础。重整军备的开始、四年计划的提出、莱因区的再军事化、轴心的形成、反共公约的签订，诸如此类的步骤均已为既成之事。阿道夫·希特勒已成为德国无人能向他挑战的领袖；他现在可以用他所选择的手段根据他对别国所作的估计来走向他所设定的目标。这些手段和估计，其根源和性质均已在上面论及。他现在已有机会来应用它们。德国要发动战争的决心，已成为世界外交上的中心论题。希特勒行动的方式、有些人怎样力图不让他这么干、另一些人怎样希望从他的政策中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形势如何发展，这些就是后来几年里的和本编的主题。

在这种研究工作中，笔者因蒙多方协助而应感谢之处，几乎与注释增加得一样快。我在许多方面获得如下诸位好心友人的帮助：弗里茨·爱泼斯坦、约瑟夫·安德勒、哈罗德·多伊奇、唐纳德·瓦特、约纳桑·佐拉奇。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已故的霍华德·史密斯曾大力惠予多方协助。

国会图书馆的手稿部、国务院史料处、军务局军事档案处（现

在是国立档案馆军事档案处)、军史局外事研究处、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伦敦维也纳图书馆、西德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弗赖堡德国军事档案馆、波恩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和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均对我极有助益。我有幸与多位学者一起承蒙帕特里夏·道林协助，查阅了国立档案馆的国务院记录。伦敦公立档案局的人员十分慷慨地满足了我的多次要求。该局的英国外交部、内阁、哈里法克斯勋爵和内维尔·汉德森爵士文件的引语，均经英女王陛下的王室文书处总管的概允而被复制。

威廉·多德的家属曾允许我使用多德的资料。经杰伊·皮埃邦·莫法特的遗孀阿尔伯特·莱维特夫人的允许，我使用和援引了莫法特的资料。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曾允许我查阅威廉·菲利普斯的资料。德拉威大学图书馆允许我使用乔治·梅塞史密斯的资料，伦敦经济学院允许我使用休·多尔顿的资料，伦敦大学王室学院允许我查阅伊斯迈勋爵的资料，并经林德尔·哈特军事档案中心的托管人的许可，得以援引伊斯迈勋爵的资料，比弗布鲁克图书馆允许我使用戴维·劳合-乔治的资料，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允许我使用鲍德温和坦普尔伍德(塞缪尔·霍尔爵士)的资料。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允许我使用米尔奇资料的一批缩微胶卷。我尤其感谢洛西恩勋爵和苏格兰档案局允许我查阅和引用洛西恩文件。尼古劳斯·冯·贝洛夫和沃尔夫·埃伯哈德允许我使用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的资料。密歇根大学和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参考图书馆员们和图书馆馆际借书专家们对我极有助益。

笔者力求查阅大量和分散的现代档案的浩繁资料并将从其中所收集的大量材料加以摘引，这无疑需要研究经费。我要为下列机构的资助表示我的谢意：肯塔基大学肯塔基研究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关系部、社会科学理事理事会、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密歇根大学霍勒斯·拉克姆研究生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

基金会、美国哲学协会和查珀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小威廉·兰德·凯南信托研究基金会。

本书的看法、结论——和差错——都由作者负责。二十年来，这个撰写计划的烦琐事务、零活杂活和写作时间，均有赖于我妻威尔玛的耐心。她已得到许多次的奉献^①。

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

1978年5月

^① 作者在目录前的空白页上写有“奉献给我妻威尔玛”。——译者

目 录

(上 册)

前言	1
第一章 德国在 1937 年的地位	1
第二章 希特勒在 1937—38 年的准备	24
第三章 英法两国面临德国威胁	70
第四章 再图解决：牛赖特和哈利法克斯的出访	128
第五章 德国与 1937—39 年西班牙内战	192
第六章 德国、中日战争和三国同盟计划	227
第七章 德国、东欧、东南欧和中东	259
第八章 德国与西半球(1937—38年)	338
第九章 德意两国关系与德国兼并奥地利	354

第一章 德国在 1937 年的地位

1

到 1937 年初，德国毫无疑问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虽然完成其重整军备的计划还有巨大的差距，但德国比别国抢先一步的领先地位不仅在陆军和飞机方面提供了可用统计来衡量的有利条件；而更重要的是：这使德国在这个忧心忡忡的世界上有一种实力和信心感。^① 军备的繁荣还在德国造成了充分就业的局面，而别国则仍在与大萧条作斗争；193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向大批外宾们显示了一个统一而有决心的德国；德国领导人所流露出的信心，恰与别国的怀疑和犹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形势还有一种自我增强的方面。成功很容易使那些获得成功的人更增加信心，同时又使国内外的敌人灰心丧气。德国在心理上的优势是咄咄逼人的。德国的新地位并不是除了最留心的观察家之外别人都看不出的什么奥秘的局势新发展。恰恰相反，世界诸通讯社都派了最出色的国际问题记者驻在德国；世界上的报刊、广播和新闻影片上充满了关于第三帝国的惹人注目的、甚至令人吃惊的报导。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读到和听到德国飞机在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别国反对纳粹党政权的人，必然把德国的实力当作下列活动的主要论据：突出他们关于未来的警告，或坚持现在就采取重整军备等措施。

第三帝国在贸易上的做法，冒犯了外国工商界人士。德国的文艺检查，成了作家和艺术家谈论的题目。德国的宗教迫害，在国外有广泛的反应。德国与近在捷克斯洛伐克，远在智利的有德国血统的人之间已为人所知的或想像中的联系，已在世界各地引起

了恐惧。总而言之，德国有新闻。

在德国国内和国外人们的心目中，阿道夫·希特勒的形象已突出为第三帝国的化身。他是一位古怪和不祥的人物，似乎不知他从哪里冒了出来，而且取得了令人无法置信的权力。有关于这位怪人的种种漫画和笑话；而这种取笑却是包含着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轻微的羡慕或忧虑、恐惧或憎恨的意识。无论他疯狂反常或神志清醒、足智多谋或思想错乱、镇定自若或张惶失措，他毫无疑问总被视为一场异乎寻常的戏剧中的关键人物和主要角色。关于德国在1937年国际舞台上的具体细节的任何回顾、对于那些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在德国与别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任何探讨，都无法是全面的，除非是从如下这种世界的架构来看待这些细节和相互作用：这个世界的耳与目都集中注意着德国及其领袖。

在德国境内，纳粹党政权稳固地控制着局面。别的政党均已销声匿迹；无党派的政治团体或其他团体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新闻检查和秘密警察强化了群众宣传和思想灌输的体制。在1933年使希特勒成为总理的那次支持联合内阁的原先那种微弱多数票，到1937年已猛增为压倒多数票。虽然那些爱取笑的人说1938年选举有弄虚作假，但一切观察家都证实了这个政权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数极少的怀疑派已无话可讲了；他们如果埋怨，那也是对于该政权的具体方面，不是对整个体制的埋怨。

对纳粹党运动的唯一可能的国内挑战，来自德国陆军；空军大体上是新政权所建立的，海军建制不大，居于不重要的地位。陆军在迅速扩充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新政权比其前任诸内阁更与他们合得来；陆军中对希特勒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极少。1938年初把陆军总司令撤职的有关情况以及后来政府执行了看来是日益危险的外交政策，使少数人认清了真相；但在局势发展之前，真实的热情、职业军人的谨慎态度、或坚定的盲目精神，是居于统治地位的。

1934年6月30日谋杀事件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明德国军事首脑目光狭隘短浅。这次由希特勒亲自决定的大屠杀的受害者中，不仅包括两位将军，还包括其中一位的妻子；她曾是德国国防部长和总理的妻子，而且从来没有被控犯有任何所谓的非法行为。这次暗杀竟未被视为对陆军的侮辱。但在1938年，韦尔纳·冯·布隆贝格元帅（他与屠杀行动有牵连）与一位有“可疑经历”的妇女结婚一事，则被认为与陆军的“荣誉”不相容的。^②那些在1934年靠把“非亚利安种”同伴排挤在陆军之外而飞黄腾达的军官，将在十年后终于把那些在政治上受牵连的同伴交给刽子手。到1937年，这些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业已完成，但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过程的人选。

纳粹德国在国内地位的巩固，不仅为刚讲过的实力感提供背景，它还一直是并且仍将是希特勒在1933年以前和以后所宣扬的扩张政策的前提条件。^③他把这种国内巩固一向看成是而且继续看成是他所深信的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因此，这种显然对国内的忧虑，必须被看成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民族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希特勒执政之后分阶段在德国实行的，因此在先使希特勒能对其邻国发动侵略的最初诸阶段的几年里，巩固的过程还在继续。实际上，这种过程一直继续到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天。由此可见，为了加强纳粹党的控制和渗入德意志生活和制度而采取的诸步骤，必须被承认是1939年9月战争开始以前的几年里德国外交政策的内在方面。

德国本身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别国所实行的政策，对德国的国际地位有具体的影响。^④德国退出了国联，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步骤对德国可能造成的不利因素多半被这样的事实消除了：英法

• 指施莱歇尔之妻；施莱歇尔曾任国防部长，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总理。
——译者

两国未能使国联在处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进犯问题上获得成功,单单这种成功本来就可以使当时的国联重新获得生机。而在此以前,日本任意践踏国际准则和退出日内瓦国联的做法曾经严重地损害了国联。^⑤对意大利所实行的三心两意的制裁不仅未能加强国联,反而割断了法英两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并助长了意大利的投向德国怀抱。这种制裁的实际效果是使德国免除了因1934年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政变以及后来谋杀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富斯而对意大利在政治上所负有的责任。到1936年底,意德两国对西班牙内战的联合干涉,又使这两国有共同事业(尽管两国在西班牙有某种角逐),并且根本就阻止了意英两国之间的任何真正的和睦,尽管这两国进行了无休止的谈判,而且不时地还达成了协议。^⑥德国对西班牙的政策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但应该在此指出,希特勒1936年12月关于不增加德国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支援的决定(当时贝尼托·墨索里尼则决定大量增加意大利军队对西班牙的卷入^⑦),实际上已保证,内战将长期持续下去,从而有助于确保这种由德意两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联合行动所结成的两国联盟将不会轻易拆散。

欧洲较小的国家都害怕德国。它们各自都希望,靠圆滑地玩弄手段和宁可牺牲别国的利益,各自能避免与柏林方面发生危险的对抗。象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些中等实力的国家,都千方百计地设法与德国这个庞然大物和睦相处。除意大利之外的欧洲其他大国,都对于它们与新德国的关系感到看不分明。苏联因德国实力日益壮大而感到惊慌;苏联虽然与德国并不接壤,但仍害怕德国很可能在某一地点进攻苏联,以夺取苏联的某一部分领土。苏联领袖约瑟夫·斯大林一旦认清了这种危险,就交替采取如下两种政策:试图与德国达成协议和鼓吹组成某种反德联盟;但这两种政策都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直到那时,希特勒仍觉得没有与俄国达成

协议的需要。有希望成为俄国盟邦的诸国，对俄国的猜疑不亚于它们对德国的猜疑。

法国政府所面临的，既有国内的纷争，又有国外的危险。这两种形式的麻烦又互相助长。使第三共和国国内争吵加剧的，是在外交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对西班牙内战、对苏联、对于法意关系日益恶化、对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应采取的政策上。而且，法国的国内纷争又助长德意两国的如下估计：法国没有什么可使它们害怕的；^⑧同时，法国在大陆上的诸盟邦又不能指望这样一个法国会提供多大的帮助：它十分可能恰恰在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却是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

这种忧虑也蔓延到了英国政府。英国人虽然对于法国会有能力对中欧或东欧的任何地区提供有效援助一事表示怀疑（下文将论及此事），但对下面这一点却抱有信心：如果德国在西线出击，法国陆军将与德国陆军势均力敌。但他们有理由对于法国空军的虚弱状态和扩充不足颇感惊慌。有证据表明，法国政府是既不知道、也不关心 1937 年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在发生危机时，宛如当头一棒，使它猛醒）；但来自伦敦方面的经常促动反映出，英国对于法国在危急地区的虚弱局面颇感忧虑；法国政府在 1936 年所采取的关于把法国某些飞机工业收归国有和减少每周工作时数的措施又在无意之中加剧了这种虚弱。^⑨

伦敦政府起初不愿意向巴黎政府提出英法两国结成牢固联盟问题，生怕那样就不得不同意举行英法两国联合参谋会谈。这件事既说明了英法两国眼看德国威胁愈来愈大时所面临的拟定有效政策问题，又说明了这种威胁终于已促使两国联合起来结成牢固联盟的程度。^⑩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有两种考虑，这两者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英国军界和政界的领导人都非常担心（有其道理）：生怕法国人当时力促他们建立一支在通常所说的“大战”

中英国人所建立的那种庞大的地面部队。根据1936—37年的心理气氛，这种主张对于英国公众和政府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英国人能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这个问题。关于道格拉斯·黑格将军在1917年佛兰德战役中的作战指挥是否明智，可能有分歧；在英国绝不能再到帕兴戴尔去打仗，在这个信念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⑩

- 6 使英国不愿参加参谋会谈的第二个因素，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责任问题的大辩论。英国在责任问题上所占的真实或假想的份额，一般是与英国政策的如下两个方面有联系的：英国军事人员和海军军官与法国同类人员（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比利时的同类人员）在战前举行了参谋会议，英国未曾把自己拟采取的立场很充分地向德国讲明，以吓退德国，使它不敢用战争来赌博。虽然更新近的研究结果已大致上否定了前者并完全推翻后者是战争爆发的因素；但在三十年代，这两者在人们思想上是非常起作用的。英国立场明确就可以防止战争，这种观点将被认为是曾被一再坚持过的，起先是用以刺激英国要坚定，后来是作为这样一种因素：有人希望，一旦英国决定坚持其立场，这将成为对德国发出的有效警告。但有人担心参谋会议会把英国卷到战争中去，甚至会引起国内对这种卷入的恐惧，这种担心就长期阻碍了英法两国军事计划工作的配合。^⑪ 由于英国外交部采取了主动，由于显然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提供了动力，英国已从1937年初漠不关心和不愿意的态度一变而成为1937年底热烈鼓吹的态度；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率先主动劝说法国参加法国人几乎不敢希望的两国相互配合。^⑫

不仅关于战争起因的论据，还有关于战争进程和结局的考虑，都对英法两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战争的极大费用以及防御武器优于进攻武器的明显优势，促成了两国以防御为主的作战方针，因

为法国不愿考虑任何进攻性的陆地战略，英国也认为一旦果真发生战争，重新实行封锁就是取胜的手段。^⑭ 这两国都寄望于对国际 7 形势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特点的战略：这两国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以便对于可能受到德国威胁的任何国家立即提供援助；两国都依靠旨在长期作战的战略。这两个因素都会发挥作用，使这两国甚至更不愿在德国采取行动时去冒风险，因为德方任何行动，如果不针对这两国本身，都需要它们去帮助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塞尔维亚那样的国家：只有靠诸盟邦在代价高昂的持久战争中获胜才能帮助它。

这种不愿冒对德作战风险的态度，还因如下的持续情绪而得到增强，尤其在英国某些人士中间：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和平解决办法，对德国太苛刻了，也不公平。^⑮ 不管这种态度是否正确，它反正蒙住了许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战败的德国已从战后解决方案中脱颖而出，比 1914 年时还更为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会使德国更强大的进一步的让步（无论它怎样有理）都必然会造成欧洲形势的甚至更大的不平衡。^⑯ 许多人所想象的凡尔赛和会为了削弱德国而采取的办法，与德国在欧洲日益抬高的实力地位的现实之间矛盾竟如此大，以致需要好几年猛烈的震惊，英国的（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别国的）公众才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是巴黎和约遗留下来的现实的而不是想象的实力关系。

在欧洲以外，那些较小国家所受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德国目标的担心（尤其是那些有德裔公民的诸国）以及德国的贸易策略。对于本国一部分公民的忠诚所抱的可能怀疑，已成为愈来愈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里。纳粹分子在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团体和其他团体中的胜利（这种胜利大体上是在 1937 年里完成的），似乎指出了令人惊慌的方向。不管这个过程对有关国家提出的威胁是否现实，它所造成的印象反正对德国国内和国外德侨

德裔都是有损害的。这种团体愈来愈显得是一种世界性威胁在当地的分支；这种团体的公开表态和秘密宣传，妨碍了与德国良好关系的建立和有关国家的国内安宁。^{①7}

德国在贸易上的做法，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效果。一方面，德国政府常常愿意用高价来收买如下货物，它们在世界贸易还不景气的那几年里本来是难于销售的。^{①8}另一方面，德国有如下要求：德国的各贸易伙伴要用向德国销售货物所得的货款只能或者几乎只能在德国购货；这种要求就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如果德国人在结算时有大量的债务（他们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别国就只能要么向德国提供这种实际上是强制的贷款，要么用增加进口德国货来减少德国的债务，要按照德国所索取的价格来购买德国愿意出口的货物。^{①9}这种在德国坚持下所确定的办法，就减少了别国可以自由使用的外汇，以便在第三国购货；第三国货物的价格可能比德国货价格低些，它们对第三国货物的需要可能超过对德国货的需要。这一切做法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方面是：德国有时又把它所输入的货物再输出，以致某些国家发现在以前对德国出口货物时，按世界市价来讲售价太低了。

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用一个令人刺耳的但并非不公正的实例来说明这种制度怎样执行的：

德国用记帐结算方式从瑞典买进一千吨铁砂，来炼出五百吨铁。德国用易货方式从中国买进十吨钨，又用记帐结算方式从土耳其购进二十吨铬砂。德国用这些没有花一分钱现金买来的材料炼出五百吨优质钢。德国用本国的辅助原料、燃料、电力、劳力和技能造出（譬如说）十辆坦克、两部涡轮机和一百台打字机。坦克投入现役；德国（因为它的坦克几乎已足够了）就把去年型号的四辆坦克调出来供出口。其中两辆卖给中国，两辆卖给土耳其；德国人不仅付清了钨和铬的价

款，而且还换得十大捆棉花和一百吨黄豆。涡轮机卖给瑞典，抵偿了铁砂的价款之后还有余。九十九台打字机在英国出售，得二百英镑，用以购买无法用记帐结算方式购得的少量原料，如椰仁等。这样一来，德国陆军就获得十辆崭新的坦克，以替换四辆过时的旧坦克；德国工业获得十大捆棉花、一百吨黄豆、一架打字机（困难时期，力求节约）和二百英镑的椰仁，买了这一切而不损失任何外汇。诚然，德国就不需享用土耳其软糖和中国燕窝汤，因为土耳其棉花和中国钨对德国更为重要。但它增加了六辆坦克，能使一千名工人有两个月的工作；既然瑞典要收取铁砂的代价，就不得不购进德国的涡轮机，而瑞典也许更想买英国的涡轮机。^②

虽然很难把这种多方面的情况予以普遍适用，但可以肯定地说，在纳粹党对外贸易政策实行的开头几年，德国的许多贸易对手感到这种新体制有好处；但随着其不利因素在日常实践中变得更为重要，随着世界贸易慢慢复苏和价格日益正常，到1937年时情况似乎已发生变化。^③

德国当时对外贸易做法上能很容易发生的这种困难的具体实例，就是1937年春夏两季德国与巴西和美国这两国在德巴贸易问题上的争执。通融办法终于拟出来了，结果，巴西以前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实际上就转销德国，以前从英国输入的进口货则改从德国购买，同时巴西用德国大炮来重新装备其陆军。但在德国对外贸易做法上如此出名的特殊限制和补贴，却使德国与南美这个最大的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某种摩擦，并且使德美两国之间业已恶劣的关系更加恶化；美国赞成更自由的，不赞成更受限制的贸易政策。^④

上述实例中的德美两国之间发生的争吵，不过是德国外贸政 10
策对德美两国关系所产生的侵蚀性效果的继续而已。虽然两国实